

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

王德文

【中文摘要】本文总结了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人口转变带来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东亚经济带来了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日本和“四小龙”抓住机遇，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人力资源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既收获了人口红利，又推动了经济起飞。不过，随着人口老化，日本的现收现付制度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冲击。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养老制度安排，对收获人口红利和化解人口负债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经济增长、东亚奇迹

【作者】王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曾先后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和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询它背后的故事。

在对“东亚奇迹”的众多研究中，人口转变因素逐步受到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充分重视，被誉为是“东亚奇迹”背后的重要变量和决定性因素之一。确实，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关闭，人口老龄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同程度冲击。本文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希望为中国处理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东亚的经济发展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从 1913 年到 1950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只有 2.21%；从 1950 年到 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为 9.29%；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Maddison, 2001）。日本人均收入也显示了相同的增长态势（见表 1）。在 60 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9.34%。70 年代之后，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 90 年代经济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在 2% 以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而且还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

表 1 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增长：1960-2004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04
日本	9.34	3.89	3.25	1.53	1.48
韩国	5.65	5.47	6.52	5.46	4.73
新加坡	7.37	7.70	5.25	4.76	2.34
香港	7.11	6.94	5.52	2.85	4.04
台湾	6.02	7.84	6.43	5.30	2.83
高收入国家	4.11	2.64	2.21	1.90	1.70
中等收入国家	3.16	3.60	1.34	2.07	3.76
低收入国家	1.72	1.01	1.97	2.22	3.24
全球平均	3.24	1.87	1.25	1.36	1.62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从 60 年代初开始，时间上比日本晚十年左右。从 1960 年到 2000 年，“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在 5.6%-6.4% 之间（见表 1）。在这四十年时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香港人均收入在 60 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保持在 7.11%。新加坡和台湾人均收入都是在 70 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接近 8%。韩国人均收入在 80 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 6.52%。经过大约 40 年的经济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经济的行列。不过，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小龙”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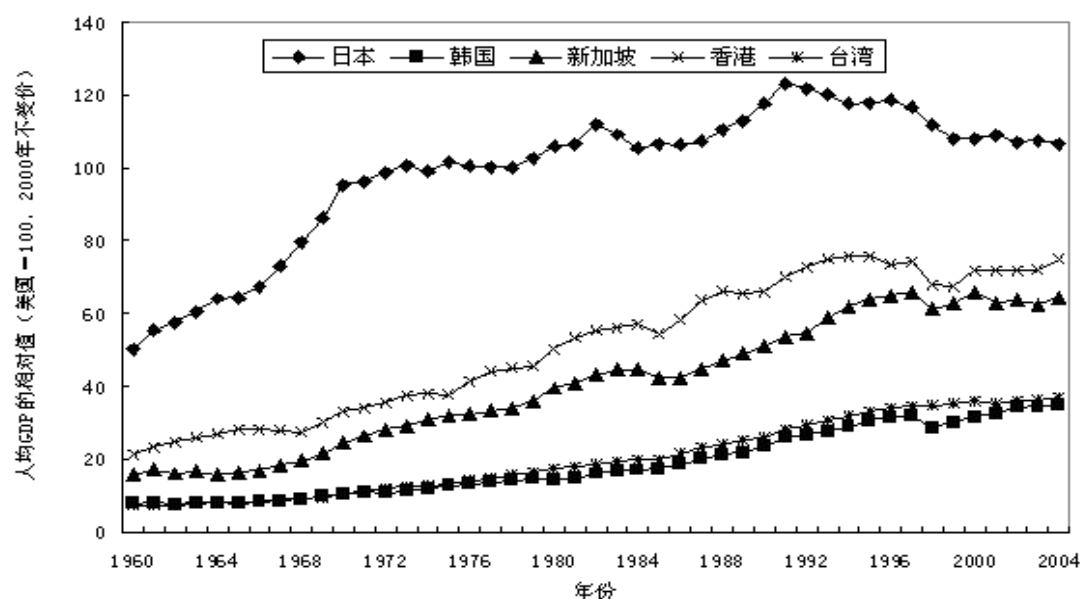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1960-2004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参照对象，图 1 显示了 1960 年到 2004 年日本和“四小龙”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1960 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 GDP 水平分别为 7093 美元、1110 美元、2203 美元、3022 美元和 1012 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 GDP 水平的 50.2%、7.9%、15.6%、

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东亚经济增长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都有明显进步。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众多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福利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越大，说明它的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越好。

表 2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

年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美国
1975	0.857	0.707	0.725	0.761	0.867
1980	0.882	0.741	0.761	0.800	0.887
1985	0.895	0.78	0.784	0.827	0.901
1990	0.911	0.818	0.822	0.862	0.916
1995	0.925	0.855	0.861	0.882	0.929
2000	0.936	0.884	—	—	0.938
2003	0.943	0.901	0.916	0.916	0.944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USA.

表 2 列举了 1975 年到 2005 年日本、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1975 年，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日本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75 年，日本人类发展指数为 0.857，与美国人类发展指数非常接近。此后，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表现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同样，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人类社会发展指数也有显著提高。从 1975 年到 2003 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提高了 0.194、0.191 和 0.155，均高于同期日本和美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速度。通过成功的经济追赶，日本和“四小龙”与美国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趋同化的态势。

二、什么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 Solow (1956) 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由外生的利率变量决定，劳动力数量增长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决定，因此，物质资本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在长期都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当经济增长过渡到稳态均衡之后，人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那么，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后来，内生增长模型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归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也是由人力资本回报的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即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唯一因素。

经济学家之间对“东亚奇迹”的来源有不同的看法。Young (1994) 认为，所谓“东亚

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从 1966 年到 1990 年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在此期间，“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随着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非农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 1.5-2 倍。在 25 年中，“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 6%-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 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 OECD 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

Krugman (1994) 认为，神话般的亚洲奇迹只不过来自高投入的经济增长。这种神话与前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相似。前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了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是当时美国经济的 3 倍。当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虽然批评前苏联经济数据有夸大成份，但也承认其增长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凯尔文·胡佛甚至得出“一个集体主义的独裁式政府在本质上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还预测前苏联经济将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超过美国。Krugman 用前苏联作为例子类比，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他还进一步将“四小龙”与日本做比较。他认为，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接近美国，技术进步在日本经济增长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四小龙”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种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Bhagwati (1996) 不同意 Krugman 的看法。他认为，“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四小龙”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投资率都非常高，并持续了 20-30 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Krugman 认为“四小龙”没有技术进步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追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如果把东亚经济增长按照每 10 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是递增的。同时，Krugman 对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 Desai (1990) 研究，缺乏有效激励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是前苏联计划经济走向崩溃的原因，而不是来自边际报酬递减所带来的投资下降。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因素，它所带来的出口增长、国际竞争、FDI 流入、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不仅刺激了国内投资，而且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World Bank (1993) 从 1991 年到 1993 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 8 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 2/3 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 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获得成功没有任何“奇迹”而言。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于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充分开发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东亚奇迹的实质是不仅有高速增长，而且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东亚奇迹”中的人口因素

无独有偶，东亚经济起飞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见表 3）。这种积极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了储蓄率，增加国内资本供给。因此，人口转变在特定阶段将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

表 3 1947-2004 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口增长率 (%)

	日本			韩国			台湾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47	34.3	14.6	19.7				38.3	18.2	20.2
1950	28.1	10.9	17.2	37.0	16.9	20.1	43.3	11.5	31.8
1955	19.4	7.8	11.6	45.7	14.9	30.8	45.3	8.6	36.7
1960	17.2	7.6	9.6	39.6	12.5	27.1	39.6	7.0	32.6
1965	18.6	7.1	11.5	33.0	10.4	22.6	32.7	5.5	27.3
1970	18.8	6.9	11.9	31.2	8.0	23.2	27.2	4.9	22.3
1975	17.1	6.3	10.8	24.8	7.7	17.1	23.0	4.7	18.3
1980	13.6	6.2	7.4	22.7	7.3	15.4	23.4	4.8	18.6
1985	11.9	6.3	5.6	16.2	6.0	10.2	18.0	4.8	13.2
1990	10.0	6.7	3.3	15.4	5.8	9.6	16.6	5.2	11.3
1995	9.6	7.4	2.1	16.0	5.4	10.6	15.5	5.6	9.9
2000	9.5	7.7	1.8	13.4	5.2	8.2	13.8	5.7	8.1
2004	8.8	8.2	0.6	9.8	5.1	4.7	9.6	6.0	3.6

资料来源: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 (2003);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of Japan,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6,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index.htm>;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http://www.nso.go.kr/eng/index.html>; 台湾内政部,《台闽地区人口统计》(历年)。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在早期,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如果人口出生率一直较高,那么,快速的幼年人口成长,将会带来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人口负担不断加重。随着生育转型加快,出生率下降带来幼年人口成长压力减少,而先前快速成长的幼年人口已经成为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于是带来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此后,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老年抚养比上升推动着总抚养比不断上升,回到高抚养比的人口负担水平。因此,人口转变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期。《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World Bank, 2002)。

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Mason, 1997;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7)。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东亚经济由过去的人口负债阶段过渡到人口红利阶段,这个过程到其结束大约有 50 年左右的时间。一般而言,东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 2.6%。但是,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估算,东亚经济在 1966-1990 年人均 GDP6-7% 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大约有 1.4-1.9 个百分点,也就是讲,相当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 1/3 (Bloom and Williamson,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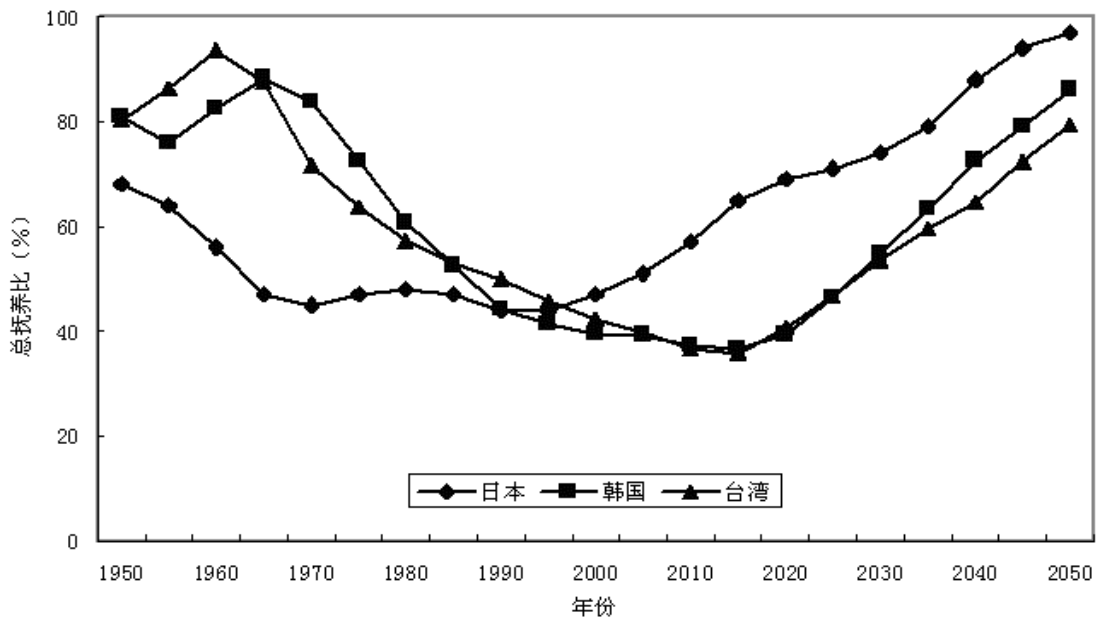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抚养比变化：1950-2050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11-1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http://www.nso.go.kr/eng/index.html>;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人力规划处,《台湾民国 93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计》(2004)。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口因素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老龄化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出生率迅速下降意味着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总抚养比从 1950 年的 68% 下降到 1970 年的 45%，进入了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时期（见图 2）。二是日本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三是教育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国民素质，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当时，日本通过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大企业通过终审雇佣制度和培训制度，培养和留住企业所需的特定人才。在农村，通过建立众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等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使农村劳动力获得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措施，一方面满足了日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训练有素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源积累实现科技创新，推动了技术进步。

亚洲“四小龙”的相似发展经验，也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关联。1961 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计划政策实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带来了总抚养比从 1965 年的 88.3% 下降到 1995 年的 41.4%，从而开启了韩国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见图 2）。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 30 多年时间里，将人均 GDP 由 1962 年的 83 美元迅速跃升至 1995 年的 1 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羨的“汉江奇迹”。

我国台湾省的人口转变时间和经济起飞时间比韩国稍早，但比日本稍晚。台湾人口抚养比呈现两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张喻婷、陈信木，2005）。在1950年到1965年期间，幼年抚养人口数量快速扩张带来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在1962年达到最高点的94.1%。196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抚养比的压力减缓，抚养比在1995年下降到45.8%。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在人口转变的同时，台湾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如从60年代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服务。这些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也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东亚奇迹”中的政府角色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一次性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失去实现起飞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会为人口负债背上沉重负担。能否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政策措施。总体而言，日本和“四小龙”都是通过制定和运用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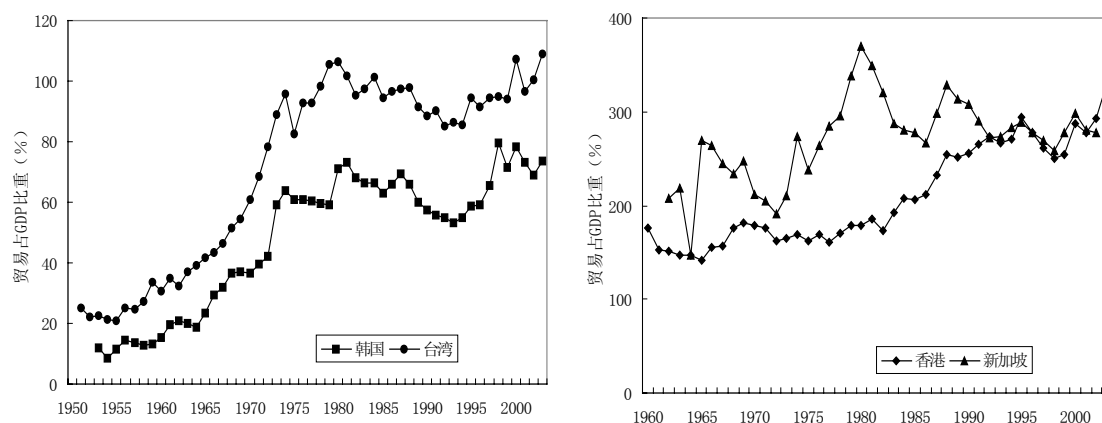


图3 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度：1960—2004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http://www.nso.go.kr/eng/index.html>; 台湾行政院，《国民所得统计》（历年）。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日本和“四小龙”的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日本在其高速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从图3可见，伴随经济起飞，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60%以上，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5%上升到80%以上，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

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战略将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年到1975年期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台湾在1970年代的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年到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

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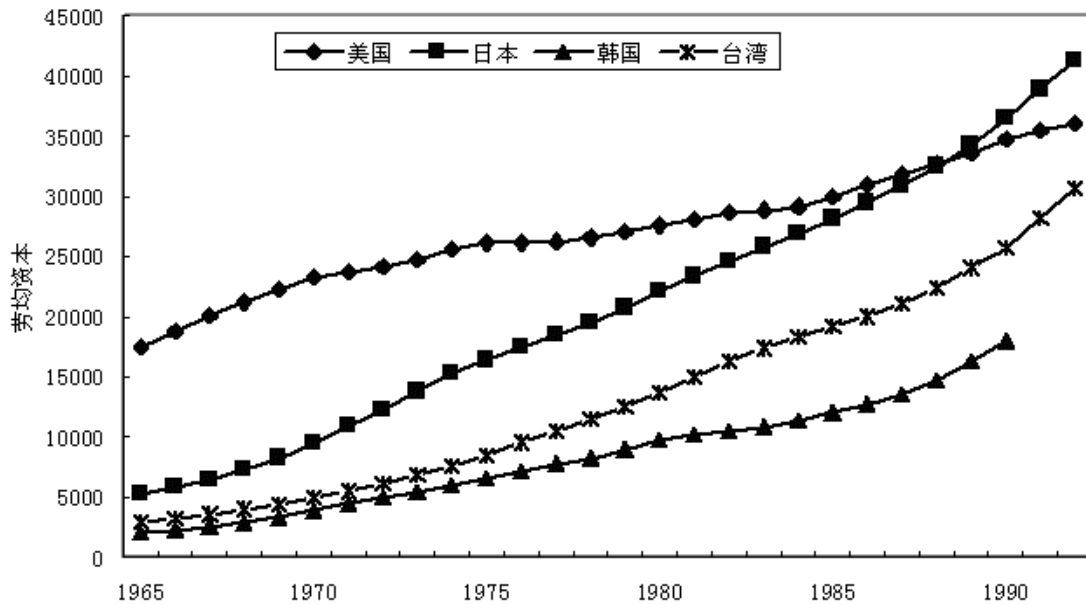


图 4 东亚经济的劳均资本数量积累：1965-1991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负担下降和外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了国内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了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 12-13%（Leff, 1969; Mason, 1997）。日本在 1960 年到 1975 年期间，国民储蓄率平均在 36.2%。从 1965 年到 1995 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 10% 上升到 36.6%。从 19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 20% 左右上升到 30% 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经济成长的快车道。图 4 展示了 1965 年到 1995 年期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 3 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五、东亚人口转变前景及其影响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总和生育率急速下降，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整个社会迅速老化，劳动供给短缺诱发的劳动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因素之一。由于各自的人口转变起点时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体制和政策、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它们所获人口红利的时间终点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四小龙”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而日本收获人口红利阶段已经结束，需要担负起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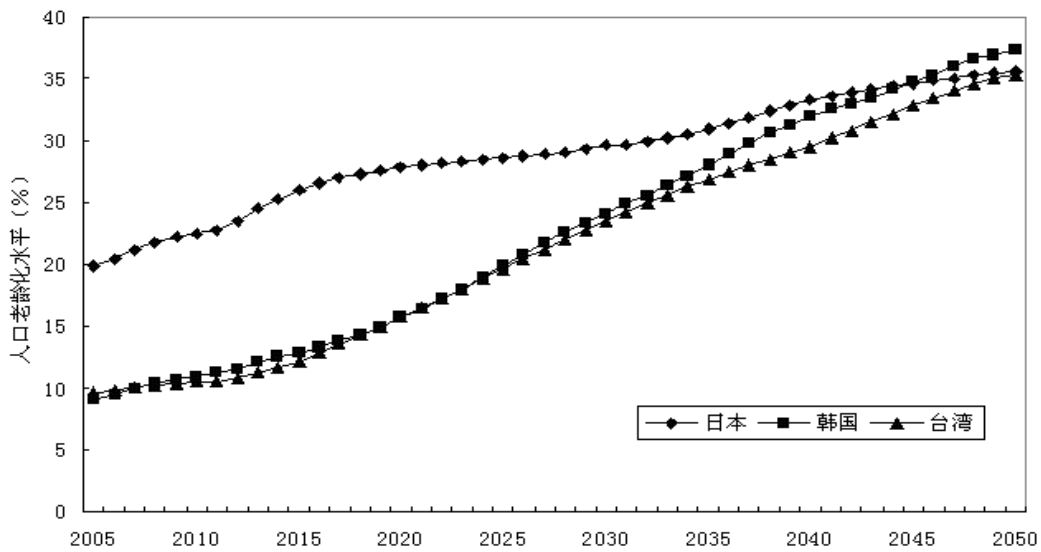


图 5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2005-2050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11-1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目前,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1950 年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只有 4.9%。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只用了 20 年时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到 1970 年,老龄化率上升到 7.1%。目前,日本老龄化率接近 20%,相当于每五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从趋势上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将进一步老化。到 2020 年,大约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到 2040 年,大约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见图 5)。亚洲“四小龙”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结果带来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更快。到 2050 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接近甚至超过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负担系数在 1970 年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之后,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给日本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人口老化所支付的社会负担急剧上升。人口结构老化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首先,人口老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抚养比,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这相当于增加了对他们的收入税,因此,削弱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意愿,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数量。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Pench (2000) 认为,老年抚养比只是一个人口学定义,它没有考虑真正提供收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是老年经济抚养比,它是指被抚养老年人口数量相当于所有就业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经济抚养比,那么,人口老龄化状况则更加严重。例如,2000 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 46%,老年经济抚养比则为 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影响大约在 0.5 个百分点。

其次，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私人储蓄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同时，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据测算，从1970年到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Yamada and Yamada, 1988）。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进一步诱发了经济增长问题。

最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日本劳动力市场非常僵硬（如终生雇佣制度），技术创新不足，储蓄减少和劳动供给下降，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资本市场不健全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人口老龄化是这些问题的内在诱因，“旧思维和旧行为的老化日本，是日本政治危机的症结。”日本能否渡过这个危机，关键看日本如何改革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为日本经济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结论

在传统的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经济学中，人口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代名词，人口数量增长结果会带来食品消费短缺问题和环境资源压力问题。所谓环境资源压力只不过是食品消费短缺问题的现代翻版。这种绝对的人口数量观不仅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且以忽略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术的制约。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可以把人口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同时也是生产者，激发人类发明创造的潜能，推动技术进步，从而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在人口、自然和环境之间形成和谐关系。

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树立新的人口观提供了一个现实支撑。然而，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并不是天赐禀赋，可以自动地获取。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是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经济起飞，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促进市场发展和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收获人口红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有人口红利期，就会有人口负债期。当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快，而“四小龙”的未来老龄化速度比日本还快。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帐户危机和财政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有惊人的相似性（黑田俊夫，1993）。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蔡昉，2004；王德文等，2004）。然而，无论是从收入水平还是从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都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东亚经济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通过最大化地实现充分就业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十一五”期间，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处于劳动力供给高峰。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而且也是发掘人口红利的唯一途径。二是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障水平相差悬殊。即使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翻两番”

的目标，届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在 3000 美元左右，但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在这样收入水平上，现收现付制不可能为全民提供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积累制度是一个可行而现实的选择。三是加大对教育、培训、卫生健康等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以及对科学研究和研发等方面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参考文献：

1. 蔡昉（2004）：《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 2 期，第 2—9 页。
2. 黑田俊夫（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第 4 期。
3. 台湾行政院：《国民所得统计》（历年）；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人力规划处：《台湾民国 93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计》（2004）；台湾内政部：《台闽地区人口统计》（历年）。
4.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第 5 期，第 2—11 页。
5. 张喻婷、陈信木（2005）：《台湾地区人口视窗分析》，台湾人口学会学术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口发展：趋势与挑战”会议论文，台北。
6. Andrew Mason (1997), *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 East-West Center, 1997, Honolulu, Hawaii.
7. Angus Mad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8. Bloom, David and Jeffrey Williamson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68.
9. Jagdish Bhagwati (1996), *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on May 3, 1996 at Cornell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10.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4.
11. Leff, Nathaniel H. (1969), *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59(5): 886~896.
12. Lucio Pench (2000),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raying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 A Policy Conference on Global Aging, January 25-26, 2000, Washington.
13.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 (2003).
14.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of Japan,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6*,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index.htm>.
15.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Republic of Korea, *Statistical Database*, <http://www.nso.go.kr/eng/index.html>.
16. Padam Desai (1990), *The Soviet Econom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aperback edition.

17. Paul S. Hewitt (2003), The Gray Roots of Japan's Crisis, *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10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8.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4 Revision and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3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p>, 2005-11-14.
19.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2(1): 65~94.
20. Tetsuji Yamada and T. Yamada (1988), The Effects of Japanes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Benefits on Personal Savings and Elderly Labor Force Behavi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2661.
2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York, 10017, USA.
22.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3.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 Washington D.C., New York.
24. World Bank, *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2004*,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25. Young, Alwyn (1994),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468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ast Asian Miracle: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Dewen W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 to 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The productiv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window” for East Asian economy to harvest demographic dividend. Japan, Hong Kong, Taiwan, Singapore and Korea firmly grasped this opportunity and realized their economic takeoff through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utilization. However,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wake of their economic takeoff produced shocks on their economic growth. The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in those econom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arrangement of old age support system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gai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relief of demographic debt.

Key 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Demographic Debt, Economic Growth and East Asian Miracle